

議 抗

錄 目 期 九 第

重慶當局緝汪令的實質	鎮南
莫斯科轉變了	西苓譯
抗戰之悲哀(插畫)	未明
英法美蘇援華的步調	侃如譯
馬克斯主義的崩潰(選錄)	毛一波
對知性的展望(續)	陸鳴一
予欲無言集	葉紀懷
新流寇術	公成
對於「建設東亞新秩序」的鄙見	沈勇
請指示我一條光明正大的死路吧(通訊)	明

版出日一十二月六年八十二國民華中

重慶當局緝汪令的實質

鎮南

主張和平救國的汪精衛先生，於本月八日被蔣介石的重慶政府下令通緝。其令文如左：

「汪兆銘違背國策，罔顧大義，於全國一致抗戰之際，潛離職守，妄主和議，并響應敵方謬論，希冀煽惑人心，阻撓大計，經中央加以懲戒，猶復不自醒悟，倒行逆施，竟於上月秘密赴滬，不惜自附於漢奸之列，與敵往還，圖謀不軌，似此通敵誤國之所為，顯屬觸犯懲治漢奸條例第二條之規定。比來海內外民衆，同深憤慨，先後呈請通緝嚴懲者，不下千餘起之多，政府如尚曲予寬容，其何以伸張國法，慰我軍民。應即由全國軍政各機關，一體嚴緝，務獲依法懲辦，以肅紀綱。此令。」

重慶政府的此一措施，我們毫不驚奇；惟覺幼稚可笑，愚笨可憐！

關於和議問題，其理由，其價值，其有利有弊，本刊已一再論及，以後仍當專文討論，且擱置不談。現在僅就這個通緝令的來因去脈稍作檢討，藉明重慶當局的本質之所在。

分析這個令文的表面，可以總括為左列五點：

- (一) 汪先生主張和議是違背國策；
- (二) 汪先生之去國是潛離職守；
- (三) 汪先生之堅持和平救國是不自醒悟；
- (四) 汪先生於上月秘密赴滬，附於漢奸之列，與敵往還。
- (五) 通緝令之頒布是循諾海內外民衆之請。

就第一點言：所謂「國策」，當然是指「抗戰建國綱領」。但在綱領的第五條，正是規定「聯合一切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之勢力，制止日本侵略，樹立並保障東亞之永久和平」。這條的涵義是什麼呢？很顯然是抵抗日本的侵略勢力樹立并保障東亞和平。根據這種涵義，可以提出一個問題：「假使日本方面停止侵略政策而願與中國共謀東亞和平，這是不是值得考慮

的呢？恐怕擁護綱領的人沒有理由可以否定這個答案吧？我們知道，日本之侵略中國，主動者是日本軍事當局而不是政治當局，多數日本政治當局明知侵略中國是失策，一心想挽回這個局面替日本自己打開一條合理的生路。這種論斷，即現在重慶當局也會一再說明過，而且會一再利用這種說明企圖分化日本的侵略陣容。去年的近衛聲明是否具有誠意，那是另一問題；若說汪先生乘近衛聲明的機會企圖利用日本的政治勢力以消除日本軍部的侵略勢力的主張是違背國策，那末國策的本身就非澈底修改不可。有人以為，日本既向我國侵略，則日本的任何行為，無論是政府的或是個人的，只要有日本二字綴在上面，便統統是惡劣的；照此說來，中國朝野人士為什麼又受寵若驚地與三三兩兩的所謂日本反戰作家大聯其歡呢？更有人要說：侵略中國的不僅是日本軍閥，日本政治家也是侵略中國的罪魁，因為他們都是帝國主義者；那末，我在此不得不大聲疾呼：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者不止日本一國：白色的，有英，有美，有法；赤色的，有蘇俄。故在綱領的條文中，沒有絲毫理由足以判決汪先生的和議主張是違背國策的行為。事實上，在抗戰未久亦即綱領實施未久的時候，主持抗戰的最高當局即從事過德大使陶德曼的和議，可惜未能成功；而決定談判的人正是今日利用國防會議的動作叫國民政府下令通緝汪先生的蔣介石將軍！如果抗戰建國綱領是絕對禁止從事和議的話，那末我們做民眾的人今天也可以援例請求國府立刻下令通緝蔣介石！

就第二點言：汪先生之去國，行蹤秘密，始終不大公開，因此而被指為潛離職守。但是我要請全國稍有人心的父老兄弟姊妹們明白：汪先生之主和，最初并不秘密，他一再向蔣先生建議，可是蔣先生表面不加評述，却在暗中監視他，這在汪先生是不曾覺知的。等到汪先生覺知的時候，環境已危險到萬分了：每天，有一位大員和二三十個所謂武裝衛隊束着他，同時每天接得無名的恐嚇：汪先生在此情形之下還能夠公然的合則留不合則去嗎？這是汪先生利用雲南省主席邀請演講而隻身逃往河內的實情，可是被指為潛離職守了。大概汪先生應該「知而不言」，或者應該聽他們宰割，聽他們兒戲國事吧？說到這裏，想起一件事來了：當第二次國民參政會開會的時候，有幾位不識相的參政員要求政府宣布外交實情，結果受着委員長的嚴重警告；而國民參政會現在是一直延會連會也不開了。試問，即使有正當意見要發表，誰又具有那般大胆呢？

就第三點言：說汪先生是執迷不悟，那正可笑，而且是說的自身了。汪先生之主和，不是偶然的盲目的行為；他認清主和是拯救國家民族的一條大路，所以他始終堅持，不為利誘，不為威屈。汪先生在第二次國民參政會開幕之前，出席中央紀

念週，申述和平要旨，有一句話說道：「三年之前，我主張和平，被打了三槍；我在今天，還是主張和平」，在座同志，聞而淚下；這種偉大的精神，是執迷不悟嗎？倒是現在的重慶當局，明知道抗戰無法支持，也想採取和議，却不肯立下決心，聽任共產黨把持操縱，這正是執迷不悟的典型呵！我們總還記得，當汪先生初到河內的時候，政府派外交部王部長帶了二百萬現款到河內，勸汪回國：一面進行和議，一面不要排除共產黨；汪先生不答應，因而有曾仲鳴先生被狙殺的慘案發生；隔了未久，又由「現在的國母」宋美齡博士出面，從香港派人向汪先生疏通，又無結果，想來就是此次下令通緝的原因了。無把握的抗戰與有利的議和，是非反正，至為顯明，究竟是誰執迷不悟呢？

就第四點言：說汪先生「秘密赴滬，與敵往還」，真是白日見鬼。這種含血噴人的慣技，惟共產黨有之。如果現在的國民政府爽截的變為蘇維埃政府，也就算了，不料國民黨的政府竟也套取這種末技！汪先生現時究在何處？有他的日常言行可為證明。至說汪先生與敵往還，事實上，到現在為止，日本當局對於汪先生的和議條件始終未曾接受，尤其是關於「以國民政府為和議對手，維持國民黨治，先行局部撤兵」這點，日本方面還疑竇汪先生在與蔣政府演雙簧哩。在全文中，甚且以為汪先生將依附現在的南北偽組織做一做二等漢奸，如果汪先生神經并未錯亂的話，我想雖婦人孺子也能放心大胆說聲「決計不會」吧！關於「與敵往還」一語，我又想起一件事來：西安事變的時候，共產黨不是還被稱為「共匪」嗎？中國紅軍不是企圖赤化中國的敵軍嗎？我們不明白：在事變的把戲中，蔣介石與西北蘇維埃政府代表即八路軍領袖毛澤東訂立秘密協定，國民政府何故不指為通敵，却一變十餘年來艱苦奮鬥的反共剿匪為聯共收匪呢？若說共匪過去雖不好，現在是好了，那末不好的日本人便永遠不會變好的嗎？若說與日本言和便是通敵，那與共匪言和又叫通什麼呢？

就第五點言：那更是自欺欺人，笑話之極！所謂「海內外民眾先後呈請通緝嚴懲者不下千餘之多」，是真是假，姑不置論。但是國家大事，豈私人好惡可比？如果汪兆銘的主和確是誤國的，則當他尚未離國之先，就該「依法懲辦以肅紀綱」了，何故還放他逃走？即說汪先生逃得秘密，則在既逃之後，就該下令通緝以便歸案究辦了，何故又先後託人去疏通？而且，當汪先生離渝時節，中央會通令全國，不得對汪攻訐。此等措施，稍言國法，稍言紀綱，能自圓其說否？若謂政府是處之寬大，愛護元勳，那末史太林的清黨大獄便不必大捧特捧了；否則，國民政府徇情溺法，便該自行解體，聽受海內外民眾的制裁！我們對於重慶當局所表示的虛偽的柔情，根本不齒；相反的，我們惟有更認清重慶政府前前後後的用心！

本來，我們對於重慶政府還存有相當的期望：期望她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精神把禍國殃民的共產黨丟去；丟去共產黨，進可以利用時機，進行有利的和平，和平不成，退可以憑自己的機構，繼續自主的抗戰。所以汪先生第一主張：一面議和，一面也不完全放棄抗戰；第二主張：戰由國府戰，和亦由國府和。汪先生并不利用日本勢力造成自己個人的局面，這是事實，是始終有目共觀的事實。不料「倒行逆施」的重慶當局，自掘墳墓，甘受他人的利用，實深痛心！

此次通緝令的頒發，是有計劃的。當命令發表前的一個月內，在重慶政府所管的大小機關中，已先後逮捕主和同志千餘人之多，連陳樹人彭學沛諸先生也在內；有的是已遭慘害了——和十六七年殘殺反蔣同志一樣，不是槍斃，不是斬首，而是用石灰袋悶死！此次「大捕汪黨」的慘案，每個來自西南的人莫不言之寒心！但我們寒心就算了嗎？

最近，有一位上海某大英國化學品貿易洋行的經理從重慶歸來，說起這種慘劇。這位經理是與英大使寇爾同往重慶去視察的——實際上他是代表英國某軍火廠去接洽軍火買賣的；他的話，絕不會全無影跡。據他說：此次逮捕汪黨，最大原因是重慶西區一個大規模的祕密軍備機關之被轟炸；重慶當局以為由於汪黨的告密，所以大肆肅清了。究竟是怎樣回事呢？一個大規模的軍備機關，無論怎樣祕密，會沒有人知道嗎？知道的人難道盡是汪黨嗎？除了汪黨決不會有他人告密嗎？即說是汪黨告密的，有成千成萬的人參與其事而皆應遭受真刑嗎？我們痛恨重慶政府的殘暴！同時可笑他的愚笨與幼稚！

另一方面，使我們不得不起懷疑的：大捕汪黨的實施，正是日本反英運動最烈的時候，緝汪令之頒布，正是天津日本當局決定封鎖英租界的時候。這時候，重慶當局為討好英國企圖再舉一筆可憐的借款起見，不得不有一堅決反日的表示；可不是所謂第二次借款又提出出口了嗎？這不是我們的無稽之談，事實是聚會在這焦點上面呵！如果重慶當局正是如此的話，那不啻飲鴆止渴，自趨滅亡：第一，英日現在雖已極端交惡，可是英國歸根結蒂是不會對日決裂的；歡聲雷動的鼓浪嶼事件英國不是完全屈服了嗎？天津租界的引渡事件英國不是已提出折衷方案（實際是預備換一個方式把四華人引渡給日方）了嗎？有一點足以證明英日會決裂起來而於中國有利呢？有那一點不足以證明英國只是為自己的利益並不是為中國呢？第二，說到借款，那真可憐，第一次的五十萬磅，只有一半可用，而且限於買她所指定的東西；總其價值，也不夠一個星期抗戰之用；這究竟是為的什麼呵！據上面說的那位洋行經理說：中國的資力至多能再維持五個半月，而外國借款的希望已極少了。我們固然不該自己拆台，然而國家民族的生死存亡并非兒戲，應該說老實話，做良心事呵！通緝汪精衛個人也能，殺死千把個主和同志也罷，只要你們當局問心對得起國家民族，對得起被你所御用的名詞，我們也就無話可說了。

莫斯科轉變了

R. A. Reynolds 著
會 西 荅 譯

208

這是我第三次游歷蘇俄；第一次在一九二九年，我在蘇俄住過幾個星期；第二次去，是一九三六年。

一九二九年的時候，蘇俄人民對於他們的前途的發展抱有莫大的希望；有一種工作，早已在貧乏而紊亂的環境中進行着——各城市各鄉村裏面，許多目光遠大意志堅強的領袖們，以提高人民生活程度為目標，做着辛勤勞苦的工作。

從那時起的幾年間的成績，凡是研究蘇俄現狀的人大概都很明瞭吧；莫斯科列寧格勒和其他許多城市，的確有不少進步，進步到現代社會的標準了。我在一九三六年第二次到蘇俄的時候，有不少城市，我從前所熟習的，那時竟不能認識了：人民的生活職業以及衛生狀況等，皆有了新的改觀。

現在是怎樣呢？我在這次到莫斯科的途中，曾發生這個問題，經過不少人煙稀少的村莊，村莊里的景象是和從前一樣荒涼冷落。——莫斯科的一切也許在停止進展了吧？人民對於清黨的動作很恐懼吧？各種社會制度要發生動搖了吧？一串一串的問題在腦海中迴旋着。

人民的生活資料似乎感覺缺乏，他們的衣物用品比兩三年前前顯得粗劣了，市場上的存貨也非常缺乏。不過，從人民的外表和一般人的活動上來看，莫斯科還不算怎樣衰落。

莫斯科城內，有不少情形還是在進步着的。我看見城中有不少新建築的大公寓和廣闊的馬路——我的車子經過幾條著名的市街；又見有新濬的運河，那條河連結了莫斯科與伏

爾加河，成為運輸出產物的要道了。跨在河上的大橋，兩邊砌着花崗岩的堤壁；各方的支流都匯合到這條河裏的。對於俄國人，水道運輸似乎比陸道運輸更為合宜；在他們看來，鐵路運輸乃是一種可怕的玩意。

十年之前，莫斯科社會對於人與人間的愛憎，認為是毫無價值的；他們以為那種情感是布爾喬亞的無聊的遺產。那時受觀眾歡迎的舞台劇的劇情，不外是表現人民對於革命的專心至意。例如一個女人發覺她的情人或丈夫有叛黨行為的時候，她會向政治警察去告密；對於個人的忠義和愛情，認為無足輕重。可是現在蘇俄舞台上所表演的戲劇已有很大的變化了：那些劇本都表示社會對於個人有莫大的關係和正常的興味；許多劇中要角都是忠實的革命黨員，做了不少造福民衆的功業，不過結局是喜劇式的：男女主角結成了夫妻。

家庭制度過去是被極端排斥的，現在，家庭生活的重要性質却又恢復了。我在參觀莫斯科的公立學校時的每每聽到學校的教職員們說明學校與學生家長有聯絡的必要；有一位學校董事甚至說：「兒童的教導者實在是家長而不是學校」，這種言論，真使我詫異之至——莫斯科現在已經有了與美國師生懇親會相似的組織，同時學校裏又有專事訪問學生家長的教員，做種種聯絡學校與家庭的活動。我回憶十年前到處可以聽到的一句口號：「國家是適當的兒童保護者」，知道現在蘇俄人民的觀念是完全改變了。

「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也是十年前流行的口號，現在也無人呼喊了。這個口號所表現的社會思想，已經失却人民的信仰。現在的一般原則是：「工作有繁簡，薪給有高低」；因此任何職務，如果需要較高學識或智慧的人才，便要給以較厚的薪給。從前國內常有鼓勵人民為社會服務的標語，現在公共場所中却是貼滿了商業競爭的廣告。這種宣傳政策，目的在大量增高生產品的需要，而工商業界之如此宣傳，乃是依據「生產愈多，利潤愈大」這個原理的。

照從前的政策，有許多種利益應該由政府授予人民。而現在人民要享受那些利益，必須付給代價，甚至學校的課本也須學生自己購買。學校中只設初級音樂課程，學生如欲學習高級音樂科目，須另行納費。人民對於奢侈品和娛樂，即使是含有所謂「教育性」的，也大都要求支付代價。離婚費已成了奢侈品的一種：第一次離婚需繳五十盧布，第二次一百五十盧布，第三次三百盧布；十年之前，請求離婚是免費的。——這種變化乃是政府鼓勵恢復大家庭制所致。

蘇俄人民——連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在內，對於國外情形是漠然不知的：這是我在這次旅程中所得到最深刻的印象。一九二九年間，我所認識的蘇俄的領袖，大多是年高的革命黨員，他們曾在國外居住求學，對於國際形勢有着很淵博的知識；現在他們大多是落伍了，有的為青年所代替。執政的青年們，除了蘇維埃的社會主義之外，便不知道其他的制度，更不知道他國民族的思想 and 行動。這種勢力逐漸擴大，因此蘇俄竟成爲一個與外國隔絕的閉關式的國家。

曾經有一次，我在美國大使館聽見人談論蘇俄的現狀，一位外國軍事專家說：「我以爲蘇俄的兵力，被人估價太高

。蘇俄軍隊固然優良，但在他們離開其根據地之後，若是不予迅速補充，那是決難持久的；這正是蘇俄兵制的弱點。蘇俄的機械化工業和運輸的組織，尚極其幼稚，所以不能抵抗連續的壓迫。僅僅戰爭的威脅，已足以使蘇俄的輕工業發生崩潰的現象了」。

我們在國外時，常常聽到關於蘇俄清黨與獄的消息，但



抗 戰 之 悲 哀 未 明

是我在莫斯科却始終沒有聽見過人談論此事。人民對於黨獄何故如此忽視？一般人何故毫不關心呢？原來人民對於政府無法公開質問，政府所發表的文件只有不敢懷疑。況且黨獄究竟與一般人民無直接關係，所以不談也罷。至於政府官吏雖然在神經極度緊張的狀態之下過活，他們也斷不談論這些問題的。

——本文譯自The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英美法蘇援華的步調

侃如譯

本文係名記者 William Henry Chamberlin 氏遍游中國時所撰的十二篇論文之第一篇，原文載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原題爲「遠東與歐洲」，因其主旨在揭開英美法蘇援華的真相，故更易今題。國人心理總是希冀各民主治國家多方援助，以期獲得最後勝利的；今讀此文，也該有所警惕，另求生路吧！ 譯者

在地理上，遠東與歐洲相距甚遠，然而在政治上却一向有着密切的關係。大戰前在中國的許多國際活動，祇能從歐洲各國間的親善和對敵這種局勢上去理解。

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件，正當歐洲列強聚精會神的從事於世界大戰而不能在遠東採取強硬行動的時候，這並非是偶然的巧合。就是日本日下的對華用兵，也是根據事實相符而且直到現在還是可靠的一種臆斷——即歐洲局勢的緊張足以阻止與中國關係最密切的國家英、法、蘇在遠東採取強硬的行動。我們還可以看出，日本歷次的單獨行動，凡使列強不感愉快的總是和歐局的緊張有更密切的關係。

日本的進攻廣州——這對香港商業

是一個嚴重的打擊，同時也是牠最後安全的一種威脅——是在去年九月間歐洲遭受戰爭威脅最厲害的時候準備着的；而進攻廣州的實行，又是在慕尼黑會議中的妥協正表示了民主國幾乎百分之百的接受了獨裁國的要求的時候。更近些時，海南島的佔領——這是使英法同樣的感覺不快的事情；在法國，因爲該島貼近印度支那；在英國，因爲這具有戰略意義的海島正位於香港的後方——是發生在西班牙局勢緊張的時機，德意又將增兵的消息傳出之後。

能避免列強干涉日下的中日戰事，對日本是有利的，正如能引起列強的干涉對中國是有利的一樣。日本既不要求，亦不希望他的歐洲的朋友（德、意）作直接的援助。他除了和德國作商業上的往來以外，在經濟上是沒有什麼其他希望的。

另一方面，中國以其傳統的「以夷制夷」的政策，運用外交的和經濟的策略，覓取他的友邦的直接援助。國民黨

執政初年的那種挑釁的民族主義政策中的許多特色已經消失了。現在他歡迎外人投資，其目的在使怎樣與中國發生了經濟關係的各國的民衆更關心中國的命運。對於外國教會教育機關，也採取了更溫和的政策。唯一的排外運動是針對着他最大的敵人——日本。

中國採取這樣的政策，其主要的目的是在引起西方列強的同情；至於和共產黨的合作，也同樣地是要獲得蘇聯的援助。

中國在覓取外國的援助以抵抗日本，這件工作上有了些什麼成就呢？財政上的直接援助是不大的。某法國銀行團要貸款數萬萬法郎建築從廣西南寧到法屬印度支那邊界的龍州間的鐵路。一羣香港財政家貸款一百萬鎊，建築長途電話。美國貸款兩千萬金元（該項借款由中國銀行担保，五年償還）。滇越鐵路的建築，顯然也有英國的借款。蘇聯則以軍火交換中國的茶磚。

凡此一切，就綜合起來，對於戰局上，也並沒有什麼重大的影響的。但是每一宗借款都可以鼓勵中國的民氣，同時使日本沮喪和憤怒。我聽到可靠的報告，說是在廣州和漢口陷落以後，蔣介石曾以坦白的言辭向英大使寇爾和美人

使約翰生表示：要免使中國投入蘇聯的懷抱或踏着崩潰的危險，中國須得有民主國的援助。英美貸款之成功，或許是得力於這種表示。

若將中國所乞援的四大民主國各自政策加以更精密的研究，我們可以發現其間存着許多的紛歧，這些紛歧阻礙了他們對遠東問題採取有力的共同政策，雖則英美法各國對於某些特殊問題和所受的損害曾屢次聯同發出牒文。

英國是西方在華投資最巨的國家，其數約為十一萬九千萬元（美國約為二萬五千萬元）。他現在處境兩難：既不能採取過份的袒華政策，又不能採取公然的親日政策。他現在是走着一條中間的道路，給中國以起碼的援助，倒引起了日本極大的惡感，中國呢，也不過略表感激而已。

諸多的顧慮，使英國不能採取袒華的政策，其最大的顧慮是歐洲的多事。只要意大利在地中海裏，對英國的兵艦旁邊，投下一二顆炸彈，英國就非常的注意起來了，可是日本在海南島的大施轟炸，英國就不生多大感覺。英國當然也是樂於跟着美國的後面來壓制日本的，只要美國「要幹了」敢擔當這個政策所引起的危險性的大部責任；假如缺少這種保證，英國的政策只好是盡可能的保護他局部的利益，並等待有利時機的到來。他若要採取親日的政策，亦為事實

所不許。一方面有本國輿論的和道德的制裁，同時他還懷疑着日本軍事極端主義者是否只要把英國從中國排擠出去就可以滿足了呢？

美國的對華政策，較諸英國，富於情緒性，而沒有英國那樣激越，這是由於他在華有廣大傳道與教育上的努力的關係。美國人民普遍的同情於中國，可是要把這種同情化為阻止日本征服中國的行動却難辦到，因為美國人除掉作自衛的打算外，是極端反對捲入戰爭旋渦的。所以，華盛頓方面，不像倫敦方面那樣，要提出妥協方案來以企圖終止中日戰爭的（除非這種方案是中日雙方都能接受的）。美國在遠東的行動，似乎祇是採取援華的形式，不願對日作何種的歧視。

蘇聯已盡了極重要的任務來支持中國的抗戰。她以條件很寬的長期貸款供給中國數百架飛機，並以卡車從新疆運入大批軍火；此外，還派遣飛行員和顧問來華。

看來倒很有趣，蘇聯表示着希望中日戰事的延長尤甚於迅速的激起中國的社會革命。他的接濟，有些是交給中央政府，不全交給共產黨的八路軍的。只要重慶發生和平的謠傳，他的接濟便中斷了。而在汪精衛出走，因之國民黨抗戰到底的意志似更堅決的時候，他的接濟便又增加了。斯丹林對華的主要目

的，似很顯然的要戰爭延長，藉以削弱日本的力量以阻其進攻西伯利亞的企圖。

法國在中日戰事裏，就大體言，佔着次要的地位；但他對於他的亞洲最富的領地（印度支那）毗連的三省雲南廣東廣西的發展極其關心。日本佔領海南島（該島位於香港和印度支那之間，如以該島為空軍根據地，更易轟炸印度支那），對於法國的面子和利益是個嚴重的打擊，若非他在歐洲有更大的顧慮，這件事恐未必能這樣的平安渡過。不過印度支那的海空軍力能否抵禦日本大規模的進攻，還是個問題。

中國正沒法將列強這些不一致的利害關係轉變為於她有利的情勢。對於列強歷次不曾採取有力行動來保護他們自身的利益，也大失所望。廣州之防衛空虛，是因中國相信了日本不敢這樣的接近香港，可是這已是證實的了！

假如和中國人談話，你可以發現他們大都具有這種無保留的信心：即國際形勢終久會轉變到有利於他們的一天；英國的忍耐是有限度的；而蘇聯為着他們自身的利益也決不會讓中國滅亡。這些期望究竟能夠實現嗎？那麼等待將後事實來證明；不過這些期望對於中國的種種打算是起了很大作用啊！

馬克斯主義的崩潰（選錄）

毛一波

一 空想的與科學的社會主義

十九世紀下半期以來，許多的社會民主黨員，都遵守着昂格思的教義，每稱十九世紀上半期和更早以前的社會主義為空想的；他們嘲笑歐文、聖西門、傅立葉為「三大空想家之出現」（註一）並且斥歐文派、聖西門派、傅立葉派為「空想者之一羣」，而他們自稱則為科學的社會主義。他們相信馬克思主義是脫離了空想的藩籬的。但事實是否這樣呢？這就不能不有疑問發生了。

以我們的觀察，所謂科學的馬格思主義，完全是抄襲十九世紀上期和更早以前那些空想的社會主義者的著作而成的。馬克思與昂格思抄襲了那些空想的社會主義者的著作之後，又從而嘲笑他們是非科學的；其滑稽與無聊，亦可想而知了。我在本文中是要舉出馬昂二氏做賊的賊證。

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多是偷竊別人來的。馬克思與昂格思共做的有名的共產黨宣言完全是抄改昆西大朗（Colonel Grand）的社會主義的原理——十九世紀民主主義宣言而成。俄人柴爾凱索夫（V. Tcherkepoff）在他的社會主義史中言之甚詳。在柴氏的書中，有一章是專論共產黨宣言的，（註二）他證明共產黨宣言中的思想完全竊自昆西大朗的著作，就是我們的標題，也是從昆西大朗處偷來的，這書（共產黨宣言）共有三五〇段，其中有三六處相同；換句話說，每九、十段就有一處是偷竊來的！著名的工團主義者索勒耳在他的馬克思主義之解體中的批評，也與此相同。博學的加爾

馬克思共產主義者，社會主義者的著者亞爾齊羅拉布柳拉氏及馬克思主義對抗社會主義的著者新考雅其，均稱揚柴氏的著作，而承認馬克思與昂格思的剽竊。（註三）其實馬克思派的碩學考茨基也承認了，他指共產黨宣言說，「這些思想，已在昆西大朗的宣言中明白表示過了」。在此，我們應該知道，昆西大朗豈不是馬克思派所嘲笑為空想的社會主義的傅立葉派嗎？何以自命為科學的社會主義者要去抄襲空想的社會主義者的著作呢？何以同樣的是關於社會主義的理論，從傅立葉派的著作中寫出來便是空的，而由馬克思派將他們的著作抄改過來，便會是科學的了呢？真是咄咄怪事呀，有人說：馬克思之科學的社會主義之所以異於空想的社會主義者，以其有『唯物史觀』。但是為什麼空想的社會主義者聖西門也有『唯物史觀』呢？

就昂格思一個人說，他也是有名的強盜。他的大著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許多都抄自莫耳更的太古社會。至於他的英國工界情形一書，則偷竊盤爾（Barclay）的英法工人的貧困，他不知盤爾這部書是很有名的，為法國科學院所嘉獎的，雖然一旦被昂格思偷了去，而改為自己的著作，但是終要露出馬腳來的啊！從前恩特萊耳教授便說過了，『昂格思的書，是將盤爾的書改做的』。但是，馬克思還盛稱昂氏此書的偉大呢！（註四）你想昂氏偷竊別人的著作而成的書，還值得他的友人馬克思的稱許嗎？並且墨爾林曾稱此書為『科學的社會主義第一種大文書』，考茨基也稱『科學的社會

主義是以此書為起點」，而中國馬克思主義的領學（？）李季先生更說：「昂格思雖不能像馬克思一樣，出身於大學，受過完備的教育，然而他的天才很大的，論年紀他比馬克思小些，論在著作界享盛名的，他却先於馬克思，因為他於一八四五年著有英國工界情形一書，這是千古傑作之一，凡共產黨宣言的種子，已含在其中，（見新青年季刊第三期馬克思傳及其學說自序）這是真話嗎？這真是『千古的傑作之一』嗎？我不知李季先生知道盤爾其人否？更知道昂格思的著作是抄改英法工人的貧困一書否？據李先生說：『共產黨宣言的種子已含在其中』，則更可證明馬克思和昂格思的著作，都是東偷西竊來的喇！並且我們知道盤爾是聖西門的研究者，也是馬克思派所謂空想的社會主義者之一呀！然而昂格思為什麼也要去抄襲這種人的著作呢；原來所謂科學的社會主義，不過抄襲空想的社會主義而成。這是怎樣滑稽的一件事情呀！可笑昂格思太無恥了！他忘去了他少年時代曾經做過強盜，而在他老年的時候還好意思去罵羅利亞（Loria）對於馬克思學說的剽竊呢！（註五）

但近來有人却在報上說，馬克思的「剩餘價值」及政治方面的「無產階級專政」乃是他新創的見解。真的嗎？

這是關於社會主義文獻中的一大問題，是不能由我們可以隨便加以論定的。馬克思究竟新創過「剩餘價值」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與否，這完全要靠社會主義文獻中的歷史事實來解答。

以我個人讀書所得的結果，我是壓根兒就不知道馬克思發明過甚麼特創的主張。然而我却能證明馬克思學說都是東抄西襲來的。這幾年來，我愈多讀馬克思昂格思下至列寧，布哈林等人的著作，我愈覺得馬克思學說的原理，都不是他自己新創的，而完全是從舊的文書中剽竊而來，就比如「剩餘價值」和「無產階級專政」罷，我說這一點也不是馬克思新創的見解，其理由如下：

我們知道，說「剩餘價值」是馬克思的創見的人，不是馬氏自己，而是專門說謊的昂格思，他在其駁杜林格一文中曾說在馬氏以前還沒有人用過「剩餘價值」一個名詞，所以他說更沒有人發明這道理，其實這完全不合事實之談。在馬氏以前，著名的經濟學家西士蒙地、湯姆生、羅德伯爾那斯第的著作中均已討論過剩餘價值了，而且羅氏自己曾聲明說：「現在我的發見是被……馬克思盜劫了」，這即是指馬克思偷去了他的「剩餘價值」的主義。（其詳，可參看毛一波的馬克思的經濟學的批評二二頁及魯智著的馬克思主義批評三五頁，這二書中均指出了許多確切的證據，我不想在此多事引用了）。而且有名的馬克思主義俄國托羅斯基更說、剩餘價值學說的創造者為細木工人白比耳（Bebel）由此，也可以證明馬氏並未發明這個原理了。

至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原理，也不是由馬克思發見的；這種思想是由於法國大革命時各黨專政得來。在馬克思以前，邊布夫，路吏布朗，勃朗起諸人已早討論過「無產階級專政」了。後來馬克思襲取了這些意思重覆申述在共產黨宣言中，但不幸這宣言中的原理又如上所說，完全抄襲自昆西太朗的十九世紀民主主義宣言一書，當然更說不上什麼創見了。此後馬氏在哥達綱領批評及法蘭西內亂中解說過無產階級專政的意義，然而也是共產黨宣言以後的事了。

這樣看來，馬克思的「剩餘價值」和「無產階級專政」兩大學說都不是馬氏自己新創的解見了。（本節完）

（註一）昂格思著：空想的及科學的社會主義第一章。

（註二）共產黨宣言的底本，惠林譯。

（註三）見馬克思主義的解體，馬克思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及馬克思主義對抗社會主義第一四八頁。

（註四）馬克思著：資本論英文本第一卷二六九頁，四三六頁及四六二頁四六四頁。

（註五）資本論第三卷第二九頁。

對知性的展望(續)

陸鳴一

三

資本主義社會的秩序，是以經濟的個人主義為原則，以經濟的自由行為中樞；於此，各個人所謂平等的原則，為社會的一切活動。但人們在經濟上的平等與在精神上的平等，固各異其事實；且資本主義「祇」在個人精神的領域上，啓示了自由平等的空洞目標，使個人或為脫開社會的一孤立的「精神自足」；個人與社會「祇」為非精神的個人之外的行為的結合，社會內的個人，「祇」由物的連繫而生有相互的行為，於是資本主義的平等，非事實上的平等，「祇」抽象的觀念的形式上可能性的平等；所以於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經濟上的不平等遂因此發展而日益擴大。

一、自商業資本主義進入於工業資本主義的階段：資本家與勞動者以及資本家與一般消費者間的不平等，日以擴大；獨占資本的強化與中小商業工業的支配關係以及農村生產與工業生產之價格的狹度差額，也擴大了社會全般的動搖與不安；於是勞動運動，無產者運動乘機而起，勞動價值說與階級理論因以展開。

二、自工業資本進入於金融資本的階段：金融資本的寡頭支配，得以確立；獨占價格因以產生，弱小資本的整理合併亦遂以急速完成；於是由財閥政黨所支配的寡頭政治亦由斯以生。

三、勞動運動，共產主義運動即發自以上諸實情，以為對資本主義經濟支配行為的反抗；這種運動就站在其自身所具有之唯物論的歷史觀的見地，把社會的變更，必得由社會下部組織的鬥爭，或勞動爭議及其他自下發生之力的鬥爭，或自下發生的革命；同時且立足於汎人類的立場上，將「第四階級的自由」代替黑格爾的論理主義；而將國際共產黨的運動立足於唯物合理主義的立場上；他們的運動就這樣的發展開來。

四、再則民族本能的自覺，也自資本主義的橫行與共產主義的惡化中，激起民族意識，努力反帝國主義的運動，使對立抗爭更激烈化；使社會愈形不安。

在此種經濟不平等日益擴大，社會愈形不安的過程中，資本主義的民主政治對於完全自由的放任行為，對於各個人的經濟活動；似已在意識地加以干涉；國家自社會安定的立場，似已在對勞動加以保護；對工業與農業生產品價格的狹度差額而生之農村的飢饉，似已在力謀救濟；近代個人之私的企業似也已現有漸歸國家統制的趨勢；然而這是資本主義社會內在開國家行為擴大的行動，不是世界文化向上性的建立。所以在國際經濟部而上，更擴大了這種矛盾：

一、由世界大戰，先進工業資本主義國家，一時為軍需的充足，會中止了輸出工業；在這期間，後進農業國家如中國、印度、南美、加拿大、澳洲等，民族產業資本得以

興起，而成爲持有半足自給之工業力的國家。

二、由後進農業國家民族資本的興起，至戰後各國回復平時產業時，對被侵略的後進國家，自失去如戰前那種農業生產原料的買收與自國工業品賣出的市場，於是在後進國與先進國間，及在本國與殖民地間，抗爭以起；後進資本主義國家是在設立保護關稅，防止外國商品的輸入；殖民地或次殖民地是在民族意識的反帝國主義運動下，努力抵制外貨；以是世界經濟自必萎縮，而發生所謂生產過剩的世界經濟恐慌。

三、其結果是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對自國的屬地或半屬地，以自己的政治力，封鎖關稅，禁止第三國商品的輸入，實施由國際「加泰爾」維持工業品價格的政策，而破壞了國際分業與自由競爭。

因此，自由貿易，自由通商，國際分業能完全行使時代的國際關係與今日的國際關係，已顯然不同；個人的經濟自由與自由貿易所形成的汎世界主義，世界和平，事實上是不得不崩潰了，於是在經濟的領域上，是不得不於經濟力以外新加一種政治力。這就是資本主義先進國之封鎖經濟政策的實行，資本主義後進國之國民主義，民族主義的興起，以及殖民地次殖民地之反帝國主義之民族主義運動的急進，現在可說是國民主義，民族主義的時代了，此種國民主義民族主義是與汎世界主義相對立，去打破從來政治秩序而建立新的國際秩序。

以上的歷史事實，總在告訴我們：個人主義是必崩潰的，連帶着對自由主義資本主義而生之共產主義這個十九世紀上一聯的個人主義汎世界主義的時代構造也必定要崩潰的。

至今日爲止，一切的合理，已成爲不合理，所以在以舊時代秩序爲背景而以「個」的解放爲中心的精神領域上的舊文化體系已否崩潰現象；所謂近代意識者，已一切成爲過去。在此知性必須改造的時代中，也自不得不對現在一點知性的流露有所展望，使在此東亞狂瘋的過程上，得一新生的駕御力量，以爲東亞和平的基礎。

五

自由貿易與國際分業所形成之世界主義的崩潰，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非建設性所形成之文化的破壞；俱在使民族主義與或國民主義之全體主義的意識發展起來，而使現時代的構造不得不以民族全體主義或國民全體主義爲中心。此種全體主義是自舊世界秩序之現實的崩潰中產生出；其文化體系亦是由舊文化體系的「否定中」而「綜合」成。這樣，所謂近代文化的批評者就不得不對近代文化提起「抗議」，而對個人主義之個的問題，加以「檢討」。

民族全體主義的人生觀與個人主義的人生觀，完全處於相反的地位。個人主義是視個人爲第一義的，原始的存在，視個人爲精神上的「自足」、被完成的一「實在」；反之，民族全體主義則視社會爲第一義的、原始的存在，個人「祇」社會的一分肢；社會非個人之單一的總和或堆積；亦非個人機械地在外部行爲上的集合體。個人與全體非在僅僅精神領域外之外部行爲的共同；個人人生下來即作爲全體生命的一分肢而存在着，在精神上亦即作爲全體生命的一部分而開始成長着。有如鐘表的機器，雜亂堆積，不能謂爲具有所謂鐘表這樣能的全體；所謂鐘表這全體構造是視爲一箇生命而存在於鐘表部分品以前，各個部分都是視爲其全體的一分節，就其地

位行使其特殊作用。所以全體必先於部分，而其部分亦祇在所謂全體的構造中，才能完成自己。個人之單一的集合非社會，個人與全體結合後，才能意識個人、生活個人；個人在精神上在物質上都不是自足的孤立者，是全體生命中的部分生命。此種生命不是在自然科學方面之分析與實驗的原子之上，成單純的思維領域上，所能領會得的。如一粒種子，落於地上，出芽、開花、結果這些事實；雖然以自然科學的分析與實驗，探求研究，去說明植物的原子，機能的細胞、成育的狀態等；然不能說明其結實之生命力的根源。又如由思惟雖似能把握此生命，然不能把握生命與外界的關聯亦及生命這本身。生命「祇」由含有知情、意的一切之「全人的直觀」，始能把握着；所以在這裏，所謂外界、內界、主觀客觀等的對立，是沒有的；物與心的對立，也是不存在的；生命不能由主知主義的論理去說明，生命是社會的歷史的實在，由生命的直觀才能體會出。

由以上的人生觀，個人是作為社會的（空間），歷史的（時間）構造內的一部分而存在着，自始即為全體的一分肢；由其與其他個的生命的接觸，才開始具有當作全體內存在着的生命，而成爲相互被喚起被創造前進的生命。可是全體的本身并不是在外部作爲一實在一權威而存在，個人的使命也不是祇在向外全體服務。全體的生命，在個人成爲全體的分肢時，表現於其個人之中，全體在個的自身中始被意識出。所以在此情形下，全體與個人或說社會、國家、民族與個人，并非對立而行使各自獨立的相互作用者，乃二者一體。於是生命的直觀哲學代替了主知的經驗論；民族全體生命的社會觀與國家觀，也就成了現時代構造的哲學基礎。

民族全體主義的社會觀與國家觀，一方面是由民族一元化之民族全體主義的理論，來確定一國家社會的政治經濟結構，另一方面是由民族一元化之民族全體政治的確立，進而至民族多元化之民族的協和，以定國際政治經濟互助連環的體系。前者是個別的國家的，後者是世界的、國際的。在完成世界的國際的新體系以前，必得先完成民族全體主義的國民新建設。所以我們對未來的國家社會的展望，就不得不自此新的社會觀國家觀上出發。

四

個人主義下，社會現象是被理解爲在個人自足上一切被完成的個人之外部的相互作用，所以在其相互作用的構成原理上，生有所謂無政府社會、權力社會、民主社會等種種形態，將其社會的機能組織，視爲國家。但民族全體主義自始即以個人生命爲社會的歷史的實在，因而各個人的生命，在個人的生死上是永久不會變的；社會的全體生命是巨過去、未來、現在、之一歷史的精神的存在。因而國家亦自非個人之單純的外部相互作用的組織，乃其自身具有全體生命。人們因能生存於一定國家內，始能生活；則國家自具有一種位於個人及個人集團精神之上的歷史生命的全體生命。但此全體（國家），因欲其完成，故亦不靜止；國家自不斷的活動，擴大自己，創造自己。而其創造，是由個人中所存有之全體內存在的精神與其他個人之同樣的精神相接觸後，被刺激起來的。由此精神的刺激，形成向全體生命更強的行動，復由此行動的發生，形成創造的實方。這就是說，全體與部分是視爲一箇生命而存在着，由此種新的全體觀而生的政治機構，自與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政治機構，有完全不同的性格；

茲分述如次：

一、集權政治：國家既視為民族的全體生命體，且具有巨過去、現在、未來之歷史的生命，所以個人在其血統的承傳上，於其歷史生命的過程上，必有共同的生命、共同的地域、共同的言語、文字、共同的風俗習慣以至共同的權力；因而其政治是作為超越個人利害的全體生命，而其具體表現出於一箇權威下行使着。個人由此全體的權威，滿足其生活，完善其生存，光輝其生命。

二、指導原理：個人向全體生命的意識，高低不齊，在其素質能力、價值上，亦參差不等；所以一國政治，不能由「完成的個人」[平等的「德」之「意志」]而行，必由全體內存在之生命的最高組織者而行。這當然由全體生命意識的高低，與實踐的強弱，產生出指揮者的原理。

三、一國一組織：將國民個人歸一於國家生命(全體生命)的組織，乃國民組織，所以這就必然的為一國一組織，而廢棄民權立法政府及利益代表黨這性質的存在，各個國民，由此組織，在其特殊部分的地位上，融合於全體，參與全體生命的發展。這種組織就成為表裏一體的全體組織不需有三權分立之相衡相制自然調節作用，而祇為三者一體的一國一組織，或說是國民自主的組織，也就是與國家生命不可分之國民文化建設的組織體，實踐體會自視為此原子利益之外部的結合，而由個人營利的本能，為經濟的活動。於此情形下，民族、國家、政治等經濟以外之力，其無全體生命的關聯，對經濟法則，必被捨棄；價值祇生命資本及勞動這些經濟活動中；於是資本秩序亦必自生產自由的過重評價，進而至主張以

共產主義的勞動價值為中心。但在今日的世界經濟上，勞動價值的不平等則生自經濟以外之力的侵入於經濟領域，以及由於各民族之環境的差異；經濟離開政治，其自體即不能存在。國民經濟的全體經濟。即生自此種經濟與政治的結合，是使全體生命向民族生產性的高度化上發展的手段；是在將民族的勞動價值，於世界經濟上，與其他世界平等交換。所以其經濟原則，對內是在排除利潤追求之無秩序的生產，公益先於私益；對外是在要求民族生產價值的平等交換，而消除國與國間的被支配關係。經濟在這裏，就成為一國(全體)的生活手段，所謂一國的計劃一國的要求，即以一國為單位，而從屬於有全體生命之組織力的政治，成為與政治一體化的經濟。所以經濟組織，經濟的諸機構，是在國民組織之中，實現其自體的機能。

由以上的觀察，國家是生活共同體的組織。此種國家觀，不視國家為「自個人而全體」的組織，是視國家(全體社會)為原始的存在，是以國家生命為中心之「自全體而個人」之組織的生命體；所以國家不是由單一的個人自下向上的機械的集體，是自上將全體生命，目下將全體內存在的意識，融合一致的生命體。所以其全體的發展，不是由各個人自由發生之力的關係去鬥爭去克服而發展，乃是在全體生命的綜合，純化的過程上而發展。這就是說，在不對立不相剋之立體的綜合之生命的擴大上，使其政治高度化，謀民族全體生命力的向上。此種國家觀念，自以民族社會的全體為基點，在世界新秩序的獨立上，或說在東亞各民族的和諧上，亦自必得以民族國家的獨立自主與其政治的機構的完成為前提條件。

(未完)

予 欲 無 言 集

葉 紀 懷

九 陣 線 論 者 不 睬 常 識 教 員

陣線論者最高興的演出是把德義日搓成一團，又把英法搓成一團，連中國也在內，把這兩團，拉拉長；拉成兩條長長的東西，叫做陣線。當他們高興到忘形的時候，便拍手大呼：「這一條是獨裁陣線！那一條是民主陣線！」

有一位小學校的常識教員問他們：「世界上有四大獨裁國家：一是德國的納粹，希特勒；二是義大利的法西斯，墨沙里尼；三是蘇俄的共產黨，史丹林；四是中國的國民黨，蔣介石。」

「世界上的英國，是個君主立憲國，不是民主國；日本和英國一像，固然不是民主，却也不是獨裁。」

「你們把她們這樣亂七八糟的搓揉，又添上她們所不稱體的塗飾，那有什麼意思呢？」

但是陣線論者似乎不懂這位常識教員的問話，一儘在搓，拉拉長，一儘排成兩條長長的東西，而且嘯叫：「兩條

蛇呀！打呀打呀！該死該死！為何只管不動呢？」

常識教員只好上課去了。

一〇 英國外交的申報觀

六月十三日申報社評，題目是「英蘇談判與侵略的進攻」，大意是批評張伯倫的沒有決心，以致侵略勢焰愈趨愈熾，說是「張伯倫的主觀上，只是想把

英蘇談判作為對德示威的武器他的目的，只是想在新方向上保持舊政策」。

但是第二天即十四日的社評，話又回過來了；這天的題目是「英國外交之明朗」，針對着昨天的；他評道：「英國之外交，在歷史上夙負盛譽，雖揆以人類文明，或衡之以羣居正義，將因時因事而得迴不相侔之評騰，尤以輒有蕪狗萬物之嫌，每為論者所不直，然彼自為計者，洵高人一等；此史家所共許，非一家之私言也」；文句過於古雅，承轉過於曲折，高深所在，非小子所得領會，但就大體揣之，其推崇英國外交之高人

一等，洵不誣也。而且他還結論道：「自後誰復憂疑於英國外交態度之依然晦澀，依然曖昧哉？故英國外交之入新階段，雖不自今日始，然證明其新階段之明朗者，事在隔昨」。妙在其中的「一個」字和「隔昨」字之下的一個「然」字，而且國學大師也賞用起「新階段來了」。

一一 「必要」與「新方案」

現在我們且說明一點小事來估價前段所提到的「哉」字。

(A) 英外相哈里法在本月八日宣佈外交政策時，說到「侵略時代已成過去，如再發生，必遇重大抵抗」，因為英國現在已採取「必要」的準備了（不過他同時提到「英蘇談判尚有若干困難」以及「德如悔過仍願與之談判」之類）。

(A二) 本月十三日天津日本當局對英租界實行封鎖後，英總領事對外報記者發表意見謂：「日方封鎖超過七星期，英方即將採「必要」之應付步驟」云。

(A三) 同日英外相在上議院說明遠東形勢時，對於謠傳日軍將於七月七

奪滬租界和英軍退出上海一節，否認退出之說，因為「以英國駐華海軍而論，司令諾白爾中將得隨時依照『必要』情形，全權處理一切」云。

(A四)這幾天盛傳有人以生命危險恐嚇英大使寇爾爵士，大使館已採取『必要』戒備，其方法是大使及大使館員已穿着鋼馬甲了。

以上是關於「哉」字的『必要』解釋。

(B一)鼓浪嶼事件現在是完全解決了；解決的辦法是怎樣呢？是鼓浪嶼公共租界當局根據英政府指示的『新方案』，接受日方兩大要求，即(一)絕對取締反日行動與(二)准日警會同逮捕反日份子；對其他要求亦在研究中。

(B二)天津英租界引渡四華人問題，因為日本弄假成真，居然實行封鎖，倫敦方面覺得不是辦法，趕快在實施封鎖的前日訓令英駐津領事向日方提出『新方案』，要求組織仲裁委員會來解決，可恨日方回答是「精神固可欽佩，但惜已過晚」！

(B三)最大的英蘇談判一事，遲遲不決；照此下去，難免大傷和氣；因此

英國當局最近又特派中歐司司長史德隆專程飛蘇，袋袋裏又有一套『新方案』。

以上是關於「哉」字解釋的『新方案』。

我們對於英國外交政策如果不可以用疑問字眼來談的話，那末總合上面A B兩類的『必要』與『新方案』便是英國外交政策的根本精神了。

一二 最掃興的事

關於英蘇談判，最最令人掃興的事，要算波羅的海這幾個小國之不識英蘇二大國之抬舉了。英蘇兩國，忙來忙去，為的要保護這幾個小國不受他國侵略，誰知他們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

舉個例子——芬蘭京城六日電：

「外長艾爾柯本日向衆院發表宣言，略謂：

「吾國向來信守國際約束，并已表明不願參加任何集團，但自衛獨立，實有必要；若埃倫特島設防問題與吾國有切實關係，事在必行。此在蘇聯亦知該島所關重大，茲乃於吾國實行設防之際，突加阻撓；且於吾人所擬之設防計劃

，在各關係國均認為適當者，惟獨蘇聯否認之！凡此均難索解。

「至以英法俄三國現行談判而論：他國若未經吾國贊同，而逕以保障吾國安全自居，吾國自未便予以接受。要之，不論何國，凡未經請求而援助吾國者，均當視同侵略國而予以擊退」云。

明明蘇聯竭力主張保障芬蘭諸小國的安全，是何等慷慨好義之事，而芬蘭諸小「狗」反而指摘蘇聯有意侵略。在蘇聯，真正有苦說不出了！

然而，話又得說回來：一個國家，各有主宰。「麻雀雖小，五臟俱全」，芬蘭等雖屬小國，難道小國便非由大國加以保護不可嗎？蘇聯或英國可以保護她，那末德國不也可以保護她嗎？假設德國提出這要求來，又怎樣呢？而且芬蘭與瑞典為自衛起見要在其共同據點的埃倫特島設防，照增強所謂民治陣線的力量說來，正是多多益善的事，何故蘇俄却又加以阻止呢？

於是，蘇聯之所謂『保護』也者，其用心不問可知；而英法蘇談判的真價值也就一目了然了！

新 流 寇 術

公 成

國人太好奇了，看了正規軍的陣地戰的失敗，不推想其實在原因，却迷信共黨的流寇行爲，名之曰游擊戰術，以爲新奇。戰後社會秩序大亂，一般不逞之徒，不知軍事爲何物，戰略戰術，更莫明其妙，竟至立正稍息開步走都不曉得，即以游擊隊相號召，結合地痞，流氓，土棍，自稱爲某某大隊長，支隊長，總隊長，總司令，名目繁多，組織龐雜，正規軍也及他不來。究其實，却是官多於兵，兵多於槍，槍多於子彈。在他們的組織裏面，除了上述的無賴之徒以外，還有專做欺騙把戲的共產黨徒，自號復興派的黃埔系，混在裏面活動，互拉民衆，互爭領導權。昔梁惠王問孟子曰：「天下爲乎定？」孟子曰：「定於一」；又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試問這班亂世魔王，殺人能手，烏能領導民衆？民衆「非心服也，力不贖焉」。份子之組織，既這樣龐雜，民間所受的痛苦，概可想見。

敵人愈深入，失陷地愈多，游擊區域也愈廣，而民衆的痛苦自然也愈深了。不顧死活的人，說什麼敵人泥足愈陷愈深，愈不能自拔，敵人所得的是幾何學上的點與線，不是面積，真是千古笑話，敵人所加的痛苦，他是敵人，自不必問，而自己的所謂游擊隊是怎樣？真是慘不忍言！游擊隊顧名思義，是匿在敵人後方，施行巡邏式的襲擊敵的武力，但事實是不然。游擊隊份子的龐雜，既如上述，在平時你繳他械，他搶我槍，互相火併，可憐好好的老百姓，枉死於火併的流彈之下者，不知凡幾。結果兼併勢厚，割據自雄，除侵吞賦稅，任意抽捐不計外，對於小有資產者妄加漢奸或其他罪名，羅織綁架，恣意勒索，不遂不休。路人行客或黑夜獨家，游擊的弟兄們，藉搜索檢查之名，探囊剝衣，翻箱倒篋，

萬一不能滿其欲壑，則用山上吊，老虎橙，燙麵餅——將鐵鍋燒紅，盡去其衣，推置其上烘灸，逼其供出錢財之所在——等方法。那真是所謂「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了。甚至游擊先生所過之處，內衫襯衣都不能曬，一鞋一襪，一草一木，無不囊括以去，秋毫無存。如有敢據理申說，則必爲槍下之枉死鬼了。他們聽到敵人要來的消息，不探虛實，不問多少，則實行三十六着中最上一着，他們逃，站在民衆的前面逃，而且順手牽羊的再發一次渾水撈魚的國難財。筆者生性慫直，有一次曾將游擊隊的份子，游擊區的情形，老老實實地告訴某負責人——現任戰區黨政委員會要職。他說：「在淪陷區域內，是要使民衆不能安枕才好；這樣才使他們曉得敵人的可惡」。唉！明明敵人沒有到的地方，自己已經弄得亂七八糟，究竟老百姓的國難是誰賜的。游擊隊還會仿倣正規軍的長沙放火而放火，自然也會仿倣正規軍的不戰而退。我國是有名的王道國，中央當局亦以推行王道自命。這樣的游擊隊，游擊術，還是自暴自棄，自滅自亡政策，還是當局所探共黨的新王道？筆者愚昧，百思不得其解。孟子曰：「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何以叢爾日本，敢欺侮我泱泱大國？馮副委員長說得好：「中國地大物博，抗戰必勝；但假使中國現在已失的土地，與歐洲各國相較，已經有好幾個國家亡了。」難道中國的土地還失得少麼？我思之又思之，這些當局的大人先生們腰纏萬貫，高喊抗戰到底，最後向外國一溜，猶可過其猶太老板的生活，雖不能叱咤風雲，還可左擁右抱。下之共產化的游擊先生們，趁火打劫，大發國難之財去做租界寓公。嗚呼抗戰！嗚呼游擊！

對於「建設東亞新秩序」的鄙見

沈 勇

上

所謂「秩序」是什麼意義呢？我的意思以為即是一種適於生存原則的生活進程的規律。這一種規律，不論在個人、在社會，在國家、在國際，都有非常迫切的需要；而這一種規律的基礎，便是「道義」。「修齊治平」是我國數千年來認為最可寶貴的整個哲學的根本原理。牠包括個人生活的指針，社會關係的法則，國家政治的原理，國際關係的大道；而且精神一貫，自個人以至於國際，其唯一的生存原則，是在於有「秩序」；而所謂「修齊治平」，即在於安定「秩序」。一個人不知自修其身，一定思想零亂，行動乖張，其所表現的生活狀態，也一定失其規律，毫無秩序，這個人的結果，勢必至一生潦倒，毫無成就，甚至動作反常，而遺整個社會以不良的影響！家庭是社會所由建立的基礎，所以每一個家庭，如果都能治得井井有條，各不相犯，家庭與家庭之間的關係，如果都能循着「道義」的規律向前發展，那末社會一定能夠繼續不斷的進化，而無鬥爭傾軋的禍患。國家的政治也是一樣，執政者對於各種政策的推行，如果能一秉着「正心誠意」為全體國民謀福利，那末全體國民一定也能竭誠擁護，共謀國家的發展；否則執政者站在某種特殊的立場上而，代表一部份人的利益而推行其自私自利的政策，置大多數民衆於不顧，這樣還能獲得全國國民的愛戴而求國家的相安無事麼？再則國與國的相處，又何嘗不然。如果大家能開誠相與，互相尊重彼此的權利與尊嚴，那自能達到共存共榮的目的，而使一切紛爭戰禍，都可避免。所以從個人的生活以至於國際的關係，都應該循着這個適於生存的規律向前發展，才能保持秩序，無抵觸衝突之患，假使違背了這個規律，就要越軌，就要破壞正常的秩序，結果，未有不發生意外的波瀾而使生存及進化受到可怕的威脅和慘烈的破壞的。

所謂東亞的秩序，本來應該比較世界任何部份都來得安定與穩固的。因為全世界各洲的土地上而，任何部份都是生長着許多種族不同的人類，他們文化各別，生活迥異，同時在一個國家裏面，包括着許多不同的種族，而一個民族又往往分散在許多國家裏面，在這種錯綜複雜的情形之下，要保持秩序的安定，自然是非常困難的事。而我們的東亞，在偌大的區域當中，澈底的說起來，可以說都是同一的黃色人種的生活地，而且生活習慣及文化都無多大的差異，同種同文這句話，好像已經把整個東亞的人類，無形中融成了一家。所以數千年來，日本文化，來自中國，中國歐化，仿自日本，和平相處，歷有年所，星使往還，互相觀摩，關係都非常親近而密切的。在這種情形之下，兩國間自能保持正常的秩序，進而相互合作，促進兩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發展。

然而現在，何以又需要建設新秩序呢？這正所謂說來話長，非三言兩語所能道出其癥結，但歸根結底的說，不能不歸咎

於西方資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共產黨的陰謀搗亂與日本軍人的專橫狂暴的行動，有以致之！

中國自從閉關自守政策給西方資本主義的鐵杵擊破以來，英美諸國的勢力即相繼侵入，於是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莫不遭受英美諸國的操縱，近百年來得寸進尺地把整個中國的命脈都握在英美的巨掌之中；其所以尚能至今不至喪失獨立國的名義者，一方面由於各帝國主義在華的勢均力敵，相持不下，使中國得以苟延殘喘，同時日本的維新，雖然其新興的國力，給中國增加一重侵略與壓迫，但一方面也打破了英美白種人自大的迷夢，對遠東問題加以重視，不敢再以過份野蠻無理的行爲加諸中國人。所以孫中山先生在民族主義中會剴切告誡國民黨員及國民務須仿效日本迎頭趕上的精神與方法，像日本一樣利用英美所長的科學以發展本國的工商業，改良中國舊有的落伍的生產方法。同時對於英美諸國的經濟侵略，更作非常的警句，以喚醒國民。他列舉中國每年受英美資本所剝削的種種利益，總數達十二萬萬元，無異每年每人繳納英美四元的人頭稅；而此種被剝削的利益，年有增加，中國四萬萬同胞，除婦女老幼殘廢不能生產者外，只有一萬萬不到的人能口夠賺錢，所以將來——十年之後——每個國民受英美的剝削每年要達四五十萬萬元；如此下去，不到十年，不必英美派兵來打我們，我們自己也要亡國了。這話之間，充滿了厭惡英美的情緒。這是事實，有中山先生所遺的文獻可資考查的。

中山先生的這些遺訓，就是指明中國的「秩序」破壞在英美諸國的手中。因此至使中國歷年變亂，國勢岌岌，民不聊生。而日本軍政當事者，更忽略了國際環境的複雜，不知道以誠意與中國國民攜手合作，徒然因憤懣中國政府的措置失當而遷怒於整個的中國國家，也追隨英美的後塵，予中國以壓迫，妄冀以武力來屈服中國，以至引起了中日兩國間的種種不幸事件。所謂東亞的秩序，就此破壞無遺了！

下

中山先生死後，英美諸國看穿了國民黨政權的那種游移不定，徬徨無主的態度，知道很可能的以挑撥離間的手段，再加以利誘威脅，使中國脫離與日本的合作，而遂其獨霸遠東的宿願；國民黨政府竟亦墮其彀中，不顧中山先生的遺教，忽視實際的形勢，只圖借重英美的力量，排除異己以支持他的政權。英美諸國更企圖獨佔中國的市場，懲患中國政府實行「抵制日貨」「仇視日人」的政策；而提高關稅壁壘與施行法幣政策，尤其英國針對日本利用其挾持中國政府一手造成的傑作。因此惹起了日本對中國加緊的進攻，而它們却坐觀成敗，待機以獲漁人之利。

中日關係的惡化，不特中國自身命運，有日就衰落的危險，更進而危及整個東亞局勢之處，中國與日本在歷史上在地理上，在利害關係上，都是不容自相傾軋的，處此世界潮流動盪不寧的局面之下，中國如能以其富藏的物力與日本雄厚的經濟力相合作，共同開發實業，即可使英美資本無法在遠東市場上立足，同時中國國民也不至飲鴆止渴地去使用高昂已極的英

美的過剩商品。英美在經濟侵略的政策，失其憑藉的根據之後，連帶在遠東的政治力量也自必隨之而消滅。如此，則中國夢寐以求的收回租界，取消不平等條約，均可不費吹灰之力而達其目的。這樣，既合於中國自身的生存原則，亦可有利於東亞大局的前途，日本軍人如能認清中日兩國攜手合作的重要，而放棄其武力征服的迷夢，以「至誠」與中國相見，共同致力於東亞勢力的發展，兩國各以所長互濟所短，而成功嚴密的政治經濟的聯合陣線，中國還能容許英美的橫行無忌麼？遠東的和平，還輪得到歐美白種人來威脅麼？

更可恨的，蘇聯也在利用了這個機會希望在中國這塊肥肉上面分嘗一盞，拚命指揮中國共產黨鼓動中日戰事的爆發，它們只要國民黨政府能夠延長其戰爭的時期，就可借着「抗戰」的美名，來欺騙國民，以達其割據地盤，擴展力量的目的。國民黨中識見遠大的人們，早已洞悉其奸，如汪精衛先生，曾幾次三番提出反共反蘇的主張，而別有用心的好戰之徒竟進一步的認蘇聯是靠山，認中國共產黨是對日作戰的唯一密友，這樣一來，遠東的危機，更其尖銳化了。遠東和平更多受一重威脅，東亞秩序更多一層被破壞的危險！

總括起來，東亞的秩序原來是安定的，因為國民政府的昏庸與日本軍人的輕狂魯莽妄啓戰端，以致招引英美帝國主義與蘇聯赤化政策的推波助瀾趁火打劫，將東亞秩序破壞得淨盡了。處此現狀之下，中國與日本的適於生存的規律，也給破壞得粉碎無遺；自此之後，中國固然要被英美蘇諸國宰割得支離破碎，永無復興之日，而日本在此大廈將傾的狀態之下，也有獨木難支之慨！所以日本遠見之士，看到整個東亞未來的危險，覺得非趕快建設東亞的新秩序不可。因此有所謂東亞新秩序建設的呼籲。他們的聲明是，「願以平等立場調整中日邦交，不以戰勝國的態度，提出任何苛刻的要求，不特沒有土地的野心，就是最普通的最平常的賠償損失也不要」。這固然是因為日本所希望達到的目的還有比領土比賠償損失更重要的目標存在着。從世界方面說，獲得領土，獲得賠款，不過是日本本國一時所得的利益，假使不來根本解決了東亞的危機，那末將來仍然難免第二次第三次的事變的；而且英美蘇諸國的侵略野心無法消弭，還有引起世界戰爭的危險。所以，為求東亞的永久和平，為求整個黃種人永遠脫離赤白兩大勢力的羈絆與操縱，那末這次的戰爭，倒是一個一勞永逸的良機。然而從東亞方面說，這是不是日本在想獨霸？是不是日本向中國的一種烟幕，這種懷疑與畏懼，曾延緩了東亞新秩序建設的力量。兩國切實精誠的合作，大家站在道義的立場上互相援助以及東亞新秩序的建立，這是中國民衆所切望的。然而這箇希望必得中國能獨立自主，在平等互惠上，始能達成。中國民族獨立自主的力量又何從生成呢？這就不得不教他們發生懷疑。日本一方面拿飛機大炮屠害我們同胞，一方面以「戰勝者自居」的心理來談互惠平等，這又不得不教他們發生畏懼。東亞秩序的早日恢復，是中國人民所渴望的，然而使這渴望，如何能教他們不「懷疑」與不「畏懼」，這是我現在更渴望於日本一般遠見之士的！

請指示我一條光明正大的死路吧

周志明

通訊

記者先生：

你以為我這句話太不近情理麼？貪生怕死，人之常情；螻蟻尚惜命，那有人而捨生求死之理？但我實在活得不耐煩了，對於「生」的趣味，簡直覺得等於嚼臘，在別人深感恐怖的死，我却認為人生最高的休憩之所，只有死才能了却一切的煩惱，消消一切的憤恨，祛除一切的惶慮。死，簡直是進入天國的階梯！我將怎樣覺得這個可寶貴的脫離苦海而登冥冥樂境的階梯呵！

八一三的全面抗戰，把我整個的靈魂沉浸在煩惱、憤恨、惶慮的深淵裏，所謂人生的痛苦，我想，到了這個地步也可算達於極點了。這樣的活着，還有什麼意義可言呢！

我是一個洋貨店的職員，戰前服務於南市東門路某五金洋貨號。該號資本有相當的雄厚，範圍也還不算小；生意

也頗當得起興隆兩個字。店裏同事，在店主人的忠誠公正的合作之下，雖然薪水不大，但是因為東家的豪爽，所以紅利比普通特別優厚。像我以每月十五元的薪水，結果合算起來，實際上總有三四十元一月的進益。一家五口的我的家庭，也儘夠維持普通的生活了。同時，

店中十餘個同事，大家大概受了店主人的忠誠的態度所感化，所以都能講究情誼，尊崇道義，主賓朋友之間，簡直比自己一家人還要親密。因此我雖然是一個小商人，但也很覺得自己的幸運，能夠在這個充滿祥和的空氣和熱烈的感情的環境中過生活。我每每自己驕傲，與其做那些慾餓薰天勢利過人的社會中的要人，老是勾心鬥角，滿腦子在打着利己害人的算盤，或是做一般套上假君子而孔高唱仁義道德的濫調而天天幹那走門路掉槍花的文人學士，學生庸人自擾

地在卑污醜惡的觀念中翻斛斗，倒不如這種逍遙自在無罪無礙的生活，來得清爽高尚多了！

誰知花不常開月不常圓，幸福的生
活，那里容得你永久享受呢？況且際此
世風日下的時代，滿眼都是穢濁的世界
，欲求在庖魚之肆的社會環境中來保持
一個小小的芝蘭之室，使其永久洋溢着
芳芳馥郁的香氣，是絕對不可能的。我
服務的商號，雖然與世無爭，與政治無
緣，絕對沒有受摧毀而消滅的危險，却
竟不免做了時代的犧牲品，把我們騙上
四面荊棘的另個社會環境之中。——八
三的戰神的鐵蹄，粉碎了我們的商號！
在戰事開始時，我的店主還沉痛地
告訴我們，犧牲了這生意興隆的店他毫
不覺心痛；就是所有的資本化為烏有，
也沒有什麼可惜；他所戀戀不捨的還是
這十餘個親如手足的同事。他不願離開

我們，我們也不願離開他，所有的同事都不忍從此勞燕分飛。因此大家決定，寧可大家一起死在砲火之中，決不輕易拆散我們這小小的團體。誰知空前的慘劫，即因此降臨到我們的頭上——在×月×日的下午，我們的房子，在抗戰鐵鳥的神勇轟炸之下毀滅了，而四萬萬同胞一分子的我們十餘個同事，也在自家人的飛飛狂炸之下演成一幅裂肢破體肉飛血濺的慘劇。結果，我那敬愛的店主與同事，全體作了抗戰的犧牲者。

當時的我，以為無疑地是跟了店主及同事之後離開這個恐怖的世界了。那知醒來時，却躺在醫院的病床上面，而且僅僅在頭上穿了一個洞。據護士的告訴，我是因為被壓在兩根木柱的交叉下面，所以沒有喪命，上面的水泥瓦石一類東西都給木柱擋住，連帶傷都很輕微的，僅被石塊敲了一小洞因而失去知覺。她們都替我慶幸道賀，說我是死裏逃生。但我深自恨着，未能追隨他們同登樂境呵！

出了醫院，好似失羣孤雁，在獵人

的火網包圍中，又悲傷，又惶急，何處是我的棲息之所呢？雖有一個破碎的窠巢，但是又將何以慰嗷嗷待哺者之望呢？戰神奪去了我生活的泉源，驟然失去了職業，一家五口不將成爲涸轍之魚麼？我的軀壳，雖然還不曾埋葬於瓦礫堆中，但精神上的安慰，已永遠被褫奪了；物質的恐慌，又迫在眉睫。這樣，我又何貴於活着，我又何需乎活着呢！

上海豈是無業的弱者所能久居之地？沒有了職業，就要失去了生命；所謂親友的援助，社會的同情，簡直等於炎夏之盼霜雪。你若無法離開上海，即不死於槍林彈雨之下，也難免流爲餓殍。我自己固早在準備着歡迎死的降臨，我又何忍教生猶不久的小孩及樂生怕死的妻室因我的無能而遭逢不應死而死的慘運呢？於是我又不能不想盡方法送他們重返故鄉。後來，總算幸運，在難得遇到的一個機會——同鄉會諸公僱用專輪載送同鄉難民回籍——中，當盡所有的衣飾，賣光所有的傢具，三錢不得兩錢的換得二三十元錢，挨過兩天兩夜的豬……生

活——難民擁擠，挨肩鵠立，直無轉身的隙地，無異於貨車上滿載着的豬羶——才能重觀家鄉風物。在雙親的慈祥的安慰之下，又覺得增加了不少生趣。

家鄉是一個偏僻的小縣，在父老口中所描寫的家鄉，簡直是瘋狂時代的世外桃源，人間樂土。據說自開天闢地以來，不曾有過戰神的光臨，直到現在，除了極少數的「跑碼頭」——到大都市營生——的年青子弟外，差不多連手槍的聲音都未曾聽見過，什麼叫飛機炸彈，當然更不知爲何物了。在被目爲「外路人」（外埠回鄉者的諱稱）的我們到家後，親族隣居，又頻添不少聽新聞的資料。於是農作之餘，晚膳之後，堂前逼坐着聽新聞的顧客，在率直淳樸的談話與燥烈濃郁的旱煙交織之下，形成一幅有特殊風味的圖畫。十餘年遠遊異鄉的我，雖然說是重返家園，在我的所發生的情緒上講，實無異於他鄉作客。過膩了都市生活之後，此時的環境，不禁使我精神爲之一爽！

鄉居的生活，把我底厭惡人生的觀

念洗去了一大半，想不到在這萬惡的世界中還有這樣一個純潔古樸的地方，我將永遠躺在故鄉的懷抱，儘我享受雙親慈祥的偉大之愛，領略山明水秀的天然圖畫。在古風盎然的環境中，也沒有明槍暗箭的那些惡毒的危害，也沒有虛偽諂詐的那些假君子的態度使我討厭，也沒有狗走蠅營那些卑污的形相使我惱恨，而又僻處天涯海角，可免戰神降臨的恐怖。這真是人間天上夠幸福的世界了。於是我又開始覺得生之意義，我又何必企求永久安穩的死的降臨呢？

不知道是我那不幸的命運貽害了我的故鄉呢？還是萬惡的時代之神不讓整個的世界有一片小小乾淨之地呢？故鄉所給予我的那種純潔清淨的幸福，還沒有享受到兩三個月，所謂世外桃源的故鄉也變成人間的地獄了。我已覺得忍無可忍的寧求速死的煩惱、憤恨、惶慮和恐怖的狂濤，迅速地洶湧到我的故鄉；於是我那有近於華胥氏之民的閩村父老兄弟，都給黑暗的陰影所籠蔽，似乎受了我的厭世觀念所傳染都有不願生存

之概。差不多上海所給我的各種罪惡的印象，現在接二連三地發生於故鄉。上海淪陷的消息，在趕市者的口中傳播到我們鄉村，這當然也引不起我們父老兄弟們的心理上怎樣嚴重的反映，但補充的軍隊，却會遠在兩廣四川等地開過橫臥在我們村莊的公路出現於吾人的眼前，那條灰色的長蛇，在閩村人們的眼前緩緩地遊過，這却使他們有莫知所措的感想。而耀眼的槍刺與青蛙型的爬在地上的大炮更使從未聽過槍聲的鄉人們受了下意識的警告！說到這是大砲時，立刻就有「轟轟」之聲，隱約地掠過他們的耳膜，使他們不寒而慄，覺得大禍臨頭無可避免了。而那些為國不為民的軍隊尤脫不了先天性的拉夫索糧的習慣，每一次軍隊過境時，總要拉去許多人，損失無數的金錢。高年的父老：莫不同聲浩嘆：「這樣的世界，真是做不來人了！」

「國防」這個新名詞也傳播到我那落伍的故鄉來了！新名詞帶給我們以不少的新恐怖，××師的司令部駐紮到城內

之後，父老像預言家一樣的在下斷語說：「我們的地方，本來是太平的，現在給蔣介石的軍隊一駐紮，恐怕就要引來日本飛機，那末我們××縣的末劫年到了，他們又非常怨恨地說：『這種小縣，日本人真不放在眼內，要駐什麼兵，還是調到要緊關子上去，少失幾處重要地方就好了。何必駐在這種小地方，反而害得百姓遭殃，真是天殺的呀！』果然，父老們的預料沒有錯，不到一星期，日本飛機居然光臨了，在十多個炸彈之下，斷送了三百多無辜百姓的性命，燒毀數百間房屋。從此鄉間洋溢着咒咀抗戰怨恨抗戰之聲。

誰知福無雙至禍不單行這句古話，却應在我們的故鄉！日機轟炸倒是一時的恐怖，而軍隊的無限制的犧牲却給我們村中以永久的憂慮與惶急：這就是征發壯丁了。征發壯丁的命令下來之後，刁滑的保長勾結了吃人的官吏與狼虎般的差役，新闢了一條生財大道，新增一個魚肉良儒的機會。雖然××黨部大聲宣傳，說子弟為國効勞是件無上光榮的事

，但『當炮灰』的恐怖深印在父老們的腦海，誰願意任憑自己親愛的子弟投入死神之口？於是有錢錢晦氣無錢人晦氣，明抽暗捉，青年農民都似犯了彌天大罪，難逃繩索索綁，一串串送將官裏去。於是自問有被征發的資格者，莫不紛紛逃避，以求徼倖獲免。從此鄉村中充滿了鷄犬不寧的景象，被捉者母哭妻號，淒慘的狀況，真使鐵石人也要心酸淚落。

這種厄運又光臨到我的頭上來：我那十五歲的弟弟，因為早熟的體格而犯了罪——認爲是適齡的壯丁而被捉了。老父目送着自己的愛兒給獵狗一般的警察簇擁而去，驚愕悲痛，傷心得老眼無淚可流，老母一慟之下，幾乎暈厥；合家歡樂的空氣，一變而爲慘霧愁雲的景象。我雖立即進城設法營救，竭力解釋年齡的不合，願意以身自代，都歸無效，結果還受了一頓教訓！說什麼救國要緊，抗戰事大，那裏容你顧全自身的利害呢？唉！抗戰！抗戰！天下幾許罪惡多假汝之名以行！抗戰！抗戰！你真是無辜百姓的劊子手呵！從此之後，雙親痛

子心切，弄得坐立不安，寢食無味，鄉村中大非初時面目：有錢的奔走鑽營，企圖保全子弟的性命，無錢者竄逃躲避，日與死神相搏鬥。在這種情形之下，如非雙親的創鉅痛深而不忍再加他們的驚恐的話，我真要拚着一個頭顱，奮博浪之槌，予那些逞兵構禍者以無情的一擊了！

再度征發壯丁時，我也居然榜上有名了，這更使我的父母嚇得魂飛魄散：兩個兒子，已去其一，心頭之肉，只有這僅存的一塊了，那裏還可聽到被抽的消息的呢？風聲傳來，直把悲痛弟弟的哀思也嚇得丟在半邊了。他們忙着籌備路費，收拾行裝，立逼我重回我已極度厭惡的上海來。天哪！我那裏願意再見那個藏污納垢醜態到無以復加的上海之面呢？但在雙親的哀哀苦勸之下，我不忍重傷他們創巨痛深的心，只好悻悻地踏上征塵，重來上海度那生不如死的生活！

現在我又到滬一月有餘了，一切的罪惡，較前增無減。最使我痛心的是

那些喪心病狂之徒，猶在拚命的鼓吹戰爭，激發好戰的心理，所謂『抗戰』『抗戰』的呼聲，簡直震破我已經麻木的心靈。我憤恨極了，我悲痛極了，我將不顧一切，奮我微薄的力量，與這般瘋狂之徒拚一個你死我活，甯願與之同歸於盡，不願再活着受此無限的苦痛！

不過，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既爲七尺男兒，不能爲國家民族作絲毫有益的貢獻，實太有虧做人的職責，而以寶貴的生命與那些瘋狂的狗徒相拚，也覺得太不值得。這樣想時，我又不肯隨隨便便的死了。像汪精衛先生，以黨國唯一領袖的尊榮，猶不免受盡委屈，他是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但求有利於國家民族，則任何犧牲亦所不惜；這種偉大的精神，更使我感奮萬分。記者先生！我是時時刻刻在準備着死的，只要於國家民族有利，我總願意死的，只要汪先生來領導我們爲國家民族的利益去奮鬥，我當然準備拚個一死。記者先生呀！請你指示我們一條光明正大的死路吧！